

南粵宗教信仰 与文化交流

杨鹤书◎著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丛书





广州市文史研究馆丛书

南粤宗教信仰 与文化交流

杨鹤书◎著

南粤宗教信仰与文化交流

作 者：杨鹤书

责任编辑：韦 民

封面设计：张丽娟

责任印制：涵丰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na Review Academic Publishers Limited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国卫中心16楼1602室

Rm.1602,16/F,AXA Centre,151 Gloucester Road,

Wanchai,Hong Kong

电话TEL：（852）28816391

传真FAX：（852）25042131

电邮E-mail:chinareview@chinareviewnews.com

网址：<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承 印：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

版 次：2010年11月初版

书 号：ISBN 978-988-8051-78-6

定 价：人民币38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是我在广州市博物馆、中山大学及被聘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期间，结合工作和教学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我认为只有认真的深入的进行调查研究，方能使教学和工作得以提高。故这些成果也可以说是教学和工作的产物。而认真的教学和工作也促进科学研究。如此循环，逐年积累，遂成本书书稿的基本内容。

我的科研工作，曾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即我国民族学研究；汉族客家研究；以及宗教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与客家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已收入《杨鹤书文集——少数民族与汉族客家》（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6 年版）一书中。本集收集的是宗教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内容。本研究仅以广东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为案例。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田野调查、考古和文献资料为资料主要来源，对广东宗教信仰的源流、传播和发展，它们的文化成果及相互交流进行研究。南粤宗教信仰及其文化博大精深。我这些东西，不过是管中窥豹而已！

我认为宗教和信仰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据此，就南粤而言，我在宗教信仰的分类上，想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我认为南粤宗教信仰可分为：①世界宗教（即我们通常说的五大宗教）；②民族民间宗教信仰（如粤北瑶区的宗教信仰）；③民间诸神信仰（如文、武圣；忠、义、节、烈如文天祥、陆秀

夫。对地方有贡献之士如梅州之程旻等)；④原始宗教信仰(如土地、河流、路、桥、树、石，万物有灵等)等几个层次。广东的各宗教、信仰及其祭典仪式等，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无价的文化珍品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弥足珍贵。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内容是非常广泛的。这种交流，既包括国内外的，也包括国内、区域内各民族之间，各宗教之间，甚至宗教信仰各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互动和交流。

本书大多数是旧稿，由于历史原因，许多有关资料，我未能看到，我的观点和方法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这次结集，除个别地方，我都未作大的修改，一仍其旧。谬舛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现得广州市文史研究馆资助及张嘉极馆长、李翔副馆长，文史业务处朱顺贤处长、黄晓文副调研员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得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的努力，使本书得以付梓。特对帮助本书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杨鹤书

2010年9月于中山大学

目 录

前言	杨鹤书
从公元 3 - 7 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	(1)
“金刚不烂身”与防腐葬	
——特种文物禅宗六祖真身像	(26)
广东南华寺发现八思巴文、藏文重要文物	(28)
明清之际广州佛教的复兴	(45)
为抗战胜利和平而祈祷	
——澳门保存虚云大师 1947 年秋开示归戒录	(56)
广东现存之佛教文化珍品	(66)
评改革开放后广东发现、识读的几件珍贵佛教文物	(104)
六朝时期来广州弘法的外国高僧	(111)
广东各民族中各种宗教信仰源流浅说	
——兼谈如何对待现代化建设中的宗教问题	(120)
粤北瑶族的宗教信仰及其与道教的关系	(136)
八排瑶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与道、佛教的关系	(146)
平远仁居地区客家人的民间诸神信仰与佛、道教的关系	(169)
粤东畲族与汉族客家人宗教祭典的比较	(185)
着眼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澳门宗教》	(198)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广州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问题	(201)
广东平远仁居地区客家人宗教信仰问题调查报告	(209)
名山重上读西樵	(240)
同佛不同命	
——说巴米扬大佛被毁和乐山大佛重修五周年	(245)
云冈读史	(249)
1950 年前我国民族的宗教信仰	(251)
关于重修广州城隍庙的若干想法	(288)
 附录一：梁师给作者的手书	 (290)
附录二：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本焕大师手书	(297)

从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 传播看中外文化交流

随着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必然地带来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其突出表现是公元3—7世纪佛教在广州的传播。交流方式是：从公元270—569年间，印度等国的不少僧人至广州建寺传教和翻译佛经，以及3世纪末起延续四百多年中国众多僧人到印度和南海各国的海上西行求法（学习佛经，考察寺院僧侣管理制度），形成一种文化的双向交流机制。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互化。经过选择、重造，最后参与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南禅宗。研究这样一次历史上非常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传播，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商业贸易的发展，必然带来中外文化的交流。广州历史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有史可稽的，首推佛教在广州的传播。兹就公元3—7世纪，梵僧在广州（含今广东大部分地区）译经弘法；中国僧人的海上西行求法；粤人对佛法的选择及重造看当时文化交流的特点几个问题，简析以下。

众所周知，印度等外国僧人所以能远涉重洋来到广州传播佛教，首先必须依托海上交通。据我国和有关国家的史料，秦汉时期广州的海上交通已开始发达，对外贸易初显繁荣。就海路而言，在西汉时期已与印度相通，班固《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当时中国南方与海外交通之地为交州（其地包括今广州地区），徐闻、合浦为其出港口岸。汉书所提的那些国名，都是东南亚一些地方国名，这些国家现在何处？有不同看法，而对黄支国，近代学者认为即印度南部东海岸边的建志补罗（Kancipura [今 Canijeveram]）^{〔1〕}这个看法，已为学术界所接受。就是说汉武帝以后交州与印度已有海上交通。

外国研究者也发现了先秦以来印度航海者及中外贸易的情况，他们说：“在西历纪年前 425—375 年间，即周烈王时，由古代巴比伦人所占据之爱洛瑟（Erythroed）以达中国东南海岸的海上贸易，即完全操于印度航海者之手，印人大多由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及爪哇之南以达中国海岸，而输入印度洋与波斯湾之珍珠等

物（羽淡了谛：《西域之佛教》引拉支伯理：Torrión de Lacon 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P. 386)^[2]。”

在时代上，有没有那么早，印度人是否操纵了当时海上贸易，这些问题可以继续探讨。但结合上述中国的历史文献来看，至迟到汉武帝时期，印度和西域的商人到了今广东一带是无疑问的。

到了东汉，交州到印度的交通更为兴盛，范晔《后汉书·西域天竺国传》云：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公元161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这里所说的“遣使贡献”，“来献”等虽亦有指官员往来，但更重要的是指商业，贸易的交往。因为秦汉时期，广州已兴起对外贸易，成为全国著名的商业城市之一。《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可见当日对外贸易之盛。

东汉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交州刺史步骘“迁州番禺，筑立城郭”^[3]。番禺（今广州）成为交州的州治。

三国时，“（吴）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以交趾县远，分合浦以北为广州，分交州置广州。”^[4]

由于广州地近珠江口，水陆交通便利，是理想的贸易城市。对外贸易发达很早。这也从解放后广州的考古发现得到证明。1975

年，在广州市文化局大院内发现了秦汉时期建造海船的工场遗址。按发掘的第一号船台的长、宽度计算，当时已可建宽8米，长30米，载重50至60吨木船。1954年，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过陶船模型。船分前、中、后三舱，尾部有望楼，后舱右则有厕所等生活设施；船前有锚，船后有舵。船头两边各插桨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骨干的坚牢和加深吃水线。这些说明汉代广州人已掌握了建造近海航船的技术。又以1955年龙生岗东汉墓，1957年海珠区细岗东汉墓出土的水晶球，玛瑙珠，珊瑚珠串等装饰品，以及许多地方汉墓出土的焚烧香料的陶薰炉、铜薰炉^[5]。都说明汉代海外贸易的发达，西亚、印度东南亚一带出产的香料，珠宝等已大量进口。

而且，自东汉末至两晋时期，北方战乱频仍，而岭南广州地区相对安定，所谓：“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6]故“自汉末建安到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7]北方人民很多迁居粤地，促进了广州地区经济的繁荣，也更多地带来了中原文化，促进了文化发展。三国时东吴经学家虞翻谪来广州就曾在今天光孝寺的前身虞翻院家中，“讲学不倦，门徒尝数百人。”^[8]说明三国后的广州，文化有了发展而且集结了一批相当水平的知识分子，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一个文化中心。为当时和以后较广和较深的对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特别像有高深理论的佛教文化，没有这个条件是很难交流的。

自汉末、三国始，随着广州经济、文化的发达，广州，不仅是内外商人交易之所，而且也成了使臣来往和外国人侨居之地。《艺文类聚》载“西晋太康二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9]《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云：“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各具威仪，

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些胡人，应指侨居于广州的印度人或者是中亚的波斯人。

随着经济贸易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流。随着官员、节使、商人的来往，僧侣等宗教人士的来往就不足为怪了。

二

公元3-7世纪广州对外的文化交流，集中表现为印度等国的僧人到广州传播佛教。据记载，东吴孙皓时（约公元270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来到广州，并翻译了佛经《十二游经》一卷。再过10年，西天竺（印度）梵僧迦摩罗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到了广州，建立三归、王仁二寺传授佛教^[10]。可见，早在公元3世纪后半叶，佛教便传入了广州。当然较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和形成佛教文化的交流则在东晋至唐初这段时间，他们的代表人物和事迹如下：

首先是，昙摩耶舍（Dharmayasa）到广州传教、翻译佛经和今光孝寺的创立。

“昙摩耶舍（Dharmayasa）尊者，罽宾国三藏法师也。东晋安帝隆安间，来游震旦，至广州止此。时地为虞翻旧苑，尊者乃创建大殿五间，名曰王园寺。随于此寺，奉敕译经，有武当沙门慧严笔授。”^[11]

昙摩耶舍是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人，于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至广州^[12]。“住白沙寺。耶舍善诵毗婆沙律，人咸号为大毗婆沙。时年已八十五，徒众八十五人，时有清信女张晋明，谕受佛法，耶舍为谈佛生缘起，并为译出《差摩经》一卷。至义熙中，来入长安。时姚兴僭号，甚崇佛法，既至，深加礼遇。会有

沙门昙摩掘多 (Dharmaguida) 来入关中, ……因共译《舍利佛》(Sariputra)、《阿毗昙》(Abhidharma)。以为秦弘始九年 (公元407年), 初书梵书文, 至十六年 (公元414年), 翻译方竟, 凡二十二卷。……从南游江陵……大弘禅法, ……至宋元嘉中, 辞还西域, 不知所终。”^[13]

《光孝寺志》所谓的“奉敕译经”, 大概是指在长安奉后秦国王姚兴之诏, 译《舍利佛阿毗昙》经, 而非指《毗婆沙律》与《差摩经》。因为《出三藏记集经序》云: “会天竺沙门昙摩掘多、昙摩耶舍导义学来游, 于是诏令传译。秦弘始九年, 合书梵文, 至十年寻应令出, ……十六年, 经师渐闲, 秦诏令自宣译, 皇储亲管, 理味言意兼了, 复所向尽, 然后笔受。……至十七年迄。”^[14]与《高僧传》说法一致, 足可资证。

昙摩耶舍之后, 印度僧人来广州传教的是刘宋时的求那罗跋陀 (Gunarabhatha)。据《光孝寺志》载: “刘宋武帝永初元年 (公元420年), 梵僧求那罗跋陀三藏, 飞锡至此, 始创戒坛, 制止道场。……梁 (齐) 永明间, 奉诏译《五百本经》、《伽毗利律》, 师, 西方东土皆号师为摩诃乘者, 谓其通达大乘, 游法性海也。法性之名始此。”^[15]他在光孝寺内曾建毗卢殿和戒坛 (《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志)。同书还说他在制旨寺 (今光孝寺) “奉敕译经, 后事无可查。”^[16]前辈罗香林先生说, 求那罗跋陀为求那跋陀罗 (Gunabhadra) 之误^[17]。他引慧皎《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传云:

“求那跋陀罗, 此云功德贤, 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 世号摩诃衍 (Mahayana)。本婆罗门种, 幼学五明诸论, 天文书算, 医方咒术, 莫不该博。后遇见《阿毗昙杂心》, 寻读惊

悟，乃深崇佛法焉，……既有缘东方，乃随船泛海，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35年），来至广州，宋太祖遣使迎接，既至建康（今南京），众僧俗共请出经，于祇洹寺出《杂阿含经》，东安寺出《法鼓经》。后于丹阳郡出《胜鬘楞伽经》，宝云传译，慧观执笔。后至荆州，又出《无忧王》等经。前后所出凡百余卷，常令弟子法勇，传译度语，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3年）复至建业，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卒，春秋七十有五。”

罗先生据此所作论断，我们不敢苟同。因为（一）来广州的时间不同。求那罗跋陀于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来广州，而求那跋陀罗于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到广州，先后相差15年。（二）在广州的事迹不同。求那罗跋陀曾在广州光孝寺内建立戒坛和毗卢殿，并在广州译经。而求那跋陀罗，一到广州，即为宋文帝请到首都建业（南京）去了。后者所译的佛经都是长江沿岸译的。（三）求那罗跋陀“后事不可查，”而求那跋陀罗，曾先后到过建业、丹阳、荆州等地译经，最后于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殁于建业，享年75。唯一相似的是都被称为“摩诃衍（那）”或“摩诃乘者”。“摩诃”梵文Mahayana音译，大乘之意。佛教称“摩诃衍”或“摩诃乘者”大乘法师之意，如同今天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可用以称呼具备这种资格的任何一个人一样。他们都称为大乘法师是不足奇的。可知，求那罗跋陀和求那跋陀罗应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尽管这样，《高僧传》这条史料仍是很宝贵的。其价值就在于公元5世纪前期又有一印度僧人到广州，这是以往广州地方史料所不见的。而且也是史料中首次确凿无疑地记载他是“随船泛海”“来至广州”的印度

僧人。

继求那跋陀和求那跋陀罗之后，来广州传教译经的是著名的禅宗初祖印度菩提达摩。

“初祖菩提达摩大师者，南天竺国，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于般若多罗尊者得法，尊者谓曰：‘汝与诸既得通量，达摩者，通达之义也，宜名达摩，因改今名。’……迨尊者顺世，……遂嘱弟子密多罗往天竺传法而躬至震旦，乃辞祖塔，别学侣，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萧梁普通七年，庚子年九月二十一日也。”^{〔18〕}

菩提达摩（Bodhdhama）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秋才来到广州，在今广州第九甫登陆，并在其登陆地结草庵传教。后世广人为纪念他，将其登陆地命名为“西来初地。”^{〔19〕}后至诃林（今光孝寺）^{〔20〕}传播禅法。在光孝寺大概住了一段不大长的时间，留下了“达摩井”等古迹^{〔21〕}。当时（梁）武帝崇信佛法，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使迎至金陵（今南京），与语不契，祖遂渡江北上嵩山少林寺^{〔22〕}。后来其禅宗理论，又辗转南下传入广东，这是后话。

接着为梵僧智药三藏于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502年）来粤，史乘记载他的事迹不多，只说他自西天竺携菩提树一株，航海到广州，将菩提树植于广州制旨寺（今光孝寺）戒坛前^{〔23〕}。后来中国广东的僧人又将菩提树繁殖并分别栽到其他有名的寺院中，成了广东禅林的象征。

继智药之后到广州的，是杰出的佛经翻译家、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家之一（其余三人为鸠摩罗什、玄奘和义净）的真谛。《光孝寺志》载：“陈武帝永定元年（公元557年），西印度优禅尼国（Ujjayani）波罗末陀（Paramartha）三藏，陈言真谛，来游中国，至广州，刺史欧阳颡，延居本寺。请译佛《阿毗昙》、

《般若金刚经》、《无上依经》、《僧诤多律》、《（俱）舍经》、《佛性（论）》，共计四十部，皆沙门慧恺笔授。”^{〔24〕}

关于他的贡献，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甚详：“波罗末陀，此云：真谛，或云拘那罗陀（Gunarata），此言亲依。西天竺（印度）优禅尼国（Ujjayani）人。群藏广部，罔不措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以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今广州）。沿途所经，仍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闰八月，乃届京邑。（真）谛欲传翻经教，以侯景之乱，不果宣述。……会（梁）元帝即位，乃止于金陵正观寺，翻《金光明经》，承圣三年（公元554年）二月，还返豫章，又往新吴始兴（今广东韶关市）并随方翻译，栖遑靡托。逮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七月，再还豫章，又止临安、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坏，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国（Langkasuka 一说在今马来西亚东海岸），道俗留之。遂停南越（今广州）。便于前梁旧齿，重复所翻。至文帝天嘉元年（公元560年），翻《摄大乘》等论，首尾两载，无心宁记。又讯小舶至梁安（化）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学徒留之，权止海隅，伺旅束装，未思安堵。至元嘉三年（公元562年）九月，发自梁安（化），汎舶西行。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十二月中，上南海岸，刺史欧阳颢延住制旨寺（今光孝寺），请翻新文。（真）谛顾此业缘，西路无指，乃对沙门慧恺等翻《广义法门经》及《唯识论》等。后颢薨没，世子（欧阳）纆重为檀越，开传经论，时又许焉。至光大二年（公元568年）六月，谛厌世浮杂，遂入南海北山（今广州白云山）将捐身命，道俗奔赴，伺卫防遏。时宗恺诸僧，欲延还建业，会扬犖硕望，恐夺时荣，乃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则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

隶诸华，可流荒服。帝然之。以陈宣帝太建元年（公元 569 年）正月十一日，遘疾迁化，时年七十有一。帝在梁陈二代，凡二十三载，所出经论记传，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若依陈纸翻之，则列两万余卷，今见译讫，止是数夹之文，并在广州制旨王园寺（今光孝寺）。”^[25]

真谛在中国经历梁、陈两代共 23 年，历尽坎坷，译经不舍。于陈永定元年（公元 557 年）居广州，几次想回西域，均不如愿。直至太建元年（公元 569 年）逝世，在粤亦有 12 年多。（加公元 546 年初至南海和住韶关时间，则不止 12 年）。所译经典甚丰，有 50 多部^[26]。对中国和广东的佛教传布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

以上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 3—6 世纪）印度及其他国家一些著名僧人到广东广州的情况。他们的活动主要有三：

（一）建立寺庙。如西竺僧人迦摩罗至广州建三归和王仁二寺传教，开印度僧人在广州建寺传布佛教之先河，其中尤以罽宾（今克什米尔）僧人昙摩耶舍创建制旨王园寺（今光孝寺），和后来求那罗跋陀在该寺建戒坛立制旨道场等，很快使光孝寺成为岭南首屈一指的大刹。

（二）传布佛教。上面提到的僧人都曾在广州传教。其中是昙摩耶舍到广州时已年高 85 龄。他收徒传授佛法，时有弟子 85 人，当中还有女尼。他们到广州传教的特点有三，其一，是着重宣扬佛教戒律。因为当时佛教传入中国虽 200 年左右，但从经典的完整、和佛教徒的作风等都离印度正宗的佛教相差很远。所以，他们来广州，主要是传授佛教戒律。如昙摩耶舍到光孝寺首先讲解《毗婆戒律》。而求那罗跋陀到光孝寺的第一件事是建立戒坛办理受戒事宜，以严肃戒律。